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69

2008年9月22日

奇人與奇書

— 陶晶孫及其《給日本的遺書》

高建國¹

被冤屈與被遺忘的海外赤子

被歷史遺忘的人物好似陳釀美酒，一旦揭壇便溢香滿室。

隨著和諧的文化氣氛展延，又一位 20 世紀 30 年代著名文化人物，以其獨特的文學作品與精彩的人生故事，粲然出現於國人面前。他就是抗戰期間在上海從事“反日間諜”活動，1952 年客死於日本的著名作家陶晶孫先生。

陶晶孫與郭沫若先生為連襟。陶晶孫的日籍妻子彌麗（佐藤

¹ 此文是為《給日本的遺書》中譯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8 年）所寫的后記。

操)，即郭沫若日籍妻子安娜（佐藤富子）的胞妹。

陶晶孫於辭世前兩年，在日本用日語寫就的傳世之作《給日本的遺書》，曾以優雅幽默的日式散文與深刻豐饒的哲理內涵，風靡日本讀書界，影響了戰後一代日本讀者。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伊藤虎丸先生，為此評論：“陶晶孫實際上是與魯迅有同樣意義的作家。……可能會給中國方面意外的結論是，超越了狹窄的中國文學研究範圍，對日本文學和思想給以影響的中國作家，除魯迅而外，陶晶孫是唯一的人物。”日本著名作家澤地久枝女士，則把陶晶孫譽為：“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

作為一個文化人，陶晶孫多年來對文化事業作出的貢獻傑出而多樣。

20世紀20年代，年輕的陶晶孫在日本留學期間，以日語描寫男少年畸戀女教師的性心理新潮小說《木樨》，不僅為中國現代派小說開山之作，也堪稱日本新感覺派文藝作品之先聲。

20世紀30年代，陶晶孫在上海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曾被郁達夫、錢杏村、夏衍等譽為“中國左翼文化的堅實堡壘”，為中國新文學史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而陶晶孫與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尾崎秀實合譯的《蜂起》，則打破了中國現代戲劇集在日本出版日譯本的零紀錄，並成為蜚聲國際的《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選集》名著之一。

陶晶孫受夫人彌麗協助，創辦於上海的“木人戲社”，曾為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行一時的新型木偶諷刺劇拉開序幕（陶著《勘太和熊治》上演時，由彌麗夫人親自製作木偶）。

然而，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陶晶孫卻由於複雜的人生經歷，在自己祖國長期蒙受“文化漢奸”的惡諷。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更以權威註釋把他稱為“漢奸”，導致他在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仍被打入另冊而“臭名昭著”。

掀開塵封的歷史帷幕，為陶晶孫討還清白的人，是他在中國

的胞妹——人民教師陶瀛孫。

陶瀛孫深知其兄品德高貴，不相信他會像《魯迅全集》註釋所說，真在抗戰期間當了漢奸，便以老弱之軀帶著其兄的哲嗣，親往北京有關部門申訴。陶晶孫的昔日密友、文化部老領導夏衍，遂在生命最後階段，吐露中共情報戰線長期遮罩的一段隱情：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情報戰線負責人潘漢年，因陶晶孫具有諸多日本關係，便委派陶晶孫以“落水”假象，打入日偽系統從事情報工作，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服務。夏公當年因工作關係，曾聽潘漢年當面說過此事，正是這一重要史實的知情者。

夏公用種種事實說明，陶晶孫其實是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文學界“第二個關露”。只是由於潘漢年 1955 年即被錯打成“內奸”，又於文革中冤死於勞改農場，原由潘漢年個別聯繫的陶晶孫，便在祖國失缺了真實身份。

夏公為陶晶孫所作的無可辯駁的歷史證明，得到有關方面認可。《魯迅全集》正式改變了對陶晶孫的不公正提法。陶晶孫為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長期獻身於秘密戰線的動人事蹟，遂公開浮出水面。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大潮偏興，文化界歷史人物不再引人矚目。至今在中國，知曉陶晶孫及其作品的人依然寥寥。如此冷落寂寞的狀況，令日本文學界人士也感覺驚異。

陶瀛孫老師是我早年在上海中學就讀時的班主任。陶老師於 2003 年病故前，多次對我詳述其兄的傳奇經歷，並遺贈相關史料，叮囑我寫一寫這位被冤屈與被遺忘的海外赤子。

郭沫若的連襟，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人

陶晶孫九歲那年（1906 年），便隨父親——同盟會無錫會員陶廷枋先生東渡日本，成為年齡最小的中國留學生。他因自幼接

受日本教育，不僅語言習慣、生活情趣，就連思維模式也變成日本式的了。許多日本朋友都以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陶晶孫在日本帝國大學醫學系求學時，結識了中國留學生中的“新羅曼主義”才子郭沫若。他和郭沫若都有文學創作愛好。郭善用中文創作，而他長於日文創作。於是，他們倆在文字與風格等方面互相請教，成為切磋琢磨的文學諍友，與情同手足的人生密友。

1921年，由郭沫若倡議，經郁達夫、陶晶孫、成仿吾、張資平、何畏等留日學生回應，在日本共同創辦了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創造社，約定以中文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推動“五四運動”以後興起的社會改造大業。具有虎虎生氣的創造社名，便由陶晶孫與郭沫若共同擬定。

而《創造季刊》，為了刊載陶晶孫為郭沫若新詩《湘累》譜寫的歌曲五線譜，一舉打破中文讀物豎排舊習，開創中國文學刊物鉛印橫排本之先河，也成為中國文壇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創造社曾經有過一個浪漫、青綠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孫創辦的《Green》（綠）雜誌社。《Green》在陶晶孫手裡，原為打字油印的大學生文學雜誌，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嘗試進行“美麗得很”的新文學“建塔事業”。《Green》雖然發行量不大，卻以漢、日雙語刊載各種文學作品。郭沫若、郁達夫、何畏等留日學生，都是它的忠實作者。

《Green》後來“鳳凰涅槃”，轉生為《創造季刊》，則是郭沫若在陶晶孫大力支持下，對這一共同事業的提昇。

陶晶孫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寫少年男生與女教師相愛的畸戀小說，便以優美的日文，先刊於《Green》，後又經郭沫若建議，由陶轉譯為中文，再刊於《創造季刊》。

《木樨》用靈動而細膩的現代派手法，描寫了充滿綺念的初

中男生深陷畸戀之時，曖昧閃爍的精神直覺與難以言傳的心底情愫。陶氏這種注重表達精神直覺感受的創作方法，不僅在中國當時新型作品中前所未有，“甚至早於日本新感覺派的形成”（《木樨》比橫光利一的《太陽》早刊一年）。小說中新穎奇特的比喻，如說小男生因恐懼而頭部失血，覺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飄蕩的雲等等，至今仍是評論界圈點的佳句。

而《木樨》跨越常規道德界限，大膽選擇小男生與女教師狂亂、壓抑的畸戀，作為具有病態美感的兩性關係特殊題材，也比1996年被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的丹麥、瑞典合拍電影《教室別戀》，以及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耶利內克的獲獎小說《鋼琴教師》，在同類題材選用上超前了七八十年。

在創造社從事新文學創作時期，郭沫若與陶晶孫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已與佐藤富子（安娜）結合的郭沫若，為了能與陶晶孫經常交流、唱和，特別邀請陶晶孫也遷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閣同住。抱洋閣是一家經營不利、停業已久的豪華酒店，靠出租房屋維持開銷。那時，陶晶孫與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閣二樓金碧輝煌的和式宴會廳，一起過著清貧而歡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掃全樓的衛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這“背靠松原面對海”的抱洋閣，生性敏感內向、長期徘徊於實際愛情之外的陶晶孫，巧遇前來探望胞姐安娜的純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見鍾情而墜入情網。陶晶孫遂與佐藤操在憑風臨海的藍色博多灣，宣誓締結生死情盟。陶晶孫仿效郭沫若，也給自己的東洋戀人取了個西洋化的愛稱“彌麗”（Milly）。

陶晶孫與彌麗於1924年喜結良緣。每當郭沫若與郭安娜、陶晶孫與陶彌麗，兩對風度翩翩的異國愛侶，攜手行走在博多灣風景綺麗的大街上，去參加當地“新感覺派”與“新浪漫主義”文學聚會時，總要引起過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來豔羨與讚美的目光。

彌麗十分敬愛人品真摯、多才多藝的晶孫，不僅在家中精心營造中日友人都很喜愛的溫馨氣氛，並多方襄助沫若與晶孫壯大創造社。晶孫與沫若曾通過佐藤姐妹的社會關係，多次深入仙臺等地民間，考察日本的風土民情與中日關係沿革，由此體驗一般中國留學生難以領悟的日本情趣，並獲得連一般日本學生也鮮能親睹的創作素材。

如今，聳立於昭和萬葉森林中心橡苑，永供後人瞻仰的“佐藤姐妹亭”，便記錄了這對日本姐妹與這兩位中國作家，當年在日本相濡以沫的動人事蹟。

中國“左聯”機關刊物主編

1929年春，陶晶孫應中國新文學界衆人邀請，與愛妻彌麗攜子返回中國，定居於上海市虹口區施高塔路（今山陰路）。不少左翼文化人，都聚居於這條文化氛圍濃厚的林蔭道上。

郁達夫一見好友陶晶孫歸國，便興致勃勃地陪他去施高塔路魯迅寓所，拜望文學鉅匠魯迅先生。此後，陶晶孫便經常與魯迅在魯寓或日本友人開辦的內山書店晤面。《魯迅日記》上記載了魯迅與陶晶孫之間的多次交往——有時約談於雲彩密佈的曇日，有時聚會在淅淅瀝瀝的午後雨中。

郁達夫在日本時期，便非常賞識陶晶孫的編輯與寫作才具，這時便把自己主辦、卻無大起色的《大眾文藝》，移交給陶負責。陶晶孫出任新主編後，果然不負衆望，迅速把《大眾文藝》改造成中國“左聯”機關刊物，特邀魯迅、郭沫若、馮乃超、馮雪峰、鄭伯奇、柔石、夏衍、潘漢年等左翼作家，有針對性地輪流撰稿。《大眾文藝》並開闢了醒目的“各國新興文學”專欄，大量譯介高爾基、巴比塞等俄、日、歐、美新興作家的作品，在中國首次搭起全球大眾文藝與新興文藝的討論平臺。

在陶晶孫主持下，《大眾文藝》辦得一天比一天紅火，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左翼與新興文化堡壘。雖然陶晶孫在“左聯”不是登高一呼的前臺人物，但他默默地在後臺做成了這件大事。

陶晶孫的另一突出貢獻，是在“左聯”作家中倡導進步、寬容、多元的創作與出版方針。他自己一些並不無產階級化，也不包含政治目的，只是宣揚個性解放、人性多彩的作品，不僅情感元素複雜、創作題材邊緣化，而且中日文法雜糅，卻總是毫無顧忌地發表在各種刊物上，以期引起討論。他的這類代表作，如小說《畢竟是個小荒唐了》，由於如實反映現實、“抄出人性”，也受到當時左翼文學界的高度讚揚。

而陶晶孫從日語轉譯的西歐名著——奧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新潮心理小說《盲目兄弟的愛》，日本作家根據雷馬克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改編的同名話劇劇本，都為渴求新風的中國創作界帶來震撼。

在上海施高塔路辦刊與寫作的日子，是陶晶孫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曾對胞妹等家人說，他正以雙手捧出的赤子之心，熱烈而努力地報效著親愛的祖國。

與關露同為潘漢年的秘密情報員

盧溝橋一聲炮響，改變了陶晶孫的人生軌跡。

日軍戰火逼近上海時，彌麗帶著三個幼子，出於對安全的考慮，被迫渡海回日本避難。陶晶孫則獨自一人留在上海，含著熱淚咀嚼日本侵華的濃重苦味。

最讓陶晶孫身受刺激的是，當他移居法租界楓林橋、他兼職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後，再返回日軍控制的施高塔路舊居取衣物，居然必須使用“佐藤操女士的中國男仆”這一極具侮辱性的身

份。因為日軍規定，搬離日佔區的一切中國人都已喪失居住權。由羞辱化成的怒火，在陶晶孫心中激烈地昇騰。

而且，陶晶孫每次往返自然科學研究所與施高塔路舊居，都必須穿越日軍設於外白渡橋的哨卡，向端著刀槍的“友邦”軍人行深度鞠躬禮。強烈的亡國奴感受，總使他差一點罵出聲來。

日軍在上海犯下的種種血腥暴行，也使他不堪忍受。

昔日“創造社的小夥計”、左翼作家潘漢年，此時正擔任中共設於華中敵佔區的情報網負責人。潘漢年一向偏好使用理想主義色彩濃郁的文化人，作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冒險臥底於虎穴深處的情報幹部。

神通廣大的潘漢年，一天突然穿越日寇槍炮與鐵蹄築成的防線，出現在花木掩映的楓林橋自然科學研究所。當陶晶孫發現潘漢年公然出現在日軍控制的這一重要科研機構，含笑站在他面前時，真有說不出的驚訝。潘漢年則以他出名的俐落作風，要求老友立即加入他正領導的隱蔽戰線，為抗戰從事特種工作。雖然書生氣十足的陶晶孫，覺得這並不是一項令人愉快的工作，卻在國難當頭之際，毅然接受了潘漢年交付的重任。

於是，陶晶孫與著名女作家關露一樣，成為抗戰期間中共情報組織隱蔽於上海的重要幹部，以“親日文人”的“落水”姿態出現於各處，特別是日佔區內。

曾以電影《十字街頭》插曲《春天裡》的歌詞作者，而為世人熟知的關露，在日本大使館與日本海軍部合辦的《女聲》雜誌擔任主編，並神奇地打入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身邊，為抗戰忍辱負重，從事情報工作長達六年之久。

而陶晶孫則以自己的“日人家屬”、“留日學生”特殊身份，在日本軍政人員設於上海、南京的社交場所頻繁周旋，並多次往返於中日兩國之間，巧妙收集各種反戰情報。當彌麗攜子返回上海以後，他們家便經常出現日本要人剛從前門離去，延安幹部已

從後門踏入的驚險場面。彌麗雖然對丈夫的任何事情都不過問，卻出於良知盡力掩護丈夫頗具危險性的“雙重交往”。

毋庸諱言，陶晶孫為了完成肩負的特殊使命，不得不給自己塗上一些“漢奸文人”的色彩。

那些年裡，陶晶孫不僅違心地在上海發表過擁護“大東亞共榮圈”的講話，還違心地去偽都南京，出席過“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更違心地接受周作人之邀，就任過顯赫的汪偽“中日文化協會事務局長”——雖然陶晶孫在這個局長職務上只滯留了 25 天，並婉拒了汪偽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的進一步任命，卻足以使他“墮落成不亞於周作人的文化大漢奸”的說法，沸沸揚揚傳遍了國門內外……。

陶晶孫無法為自己的“漢奸”言行做任何辯白，只得在一些文章中含蓄地訴苦：有那麼一個很高傲的人，現在被“許多蠅群把他扛到南京去……自負說餓死亦不吃腐肉之他，現在自情願給群蠅扛去了”。他“走出大門，門房起立敬禮，不自由極了，走入大門，執槍者又敬禮，敬禮有各各程度，又苦極了”。可是，陶晶孫“苦極了”也罷，“不自由極了”也罷，還得天天像蒼蠅一樣繼續“吃腐肉”。反戰義士的神聖職責，不允許他有任何退卻與動搖。

他能用於安慰自己的，大約只有寫於這一時期的這段文字：

花……任人棄在垃圾之中，任人踐踏。他自己有自己的苦惱，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狂歡，自己有自己的憧憬，也有自己的光耀。……美的是你自己，美是你心中。

潘漢年有句名言：情報幹部要有為國家徹底犧牲的精神，犧牲生命、犧牲名譽；就像古詩裡的梅花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陶晶孫這段寫“花”的文字，也許是對潘漢年作出的某種呼應吧。

據現已公開的歷史資料顯露，陶晶孫與“20世紀最偉大的國際間諜”佐爾格的首席搭檔尾崎秀實——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的日共秘密黨員，應有密切合作關係。

受到希特勒信任的德國“納粹黨員”佐爾格，其實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網負責人；其祖父擔任過馬克思的秘書。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佐爾格在上海領導遠東情報網時，曾把《朝日新聞》駐滬記者尾崎秀實發展為核心成員。那份被斯大林忽視的，德國將於1941年6月下旬進攻蘇聯的珍貴情報，即由尾崎秀實偵獲。陶晶孫早年在日本，與尾崎秀實便是關係極其親密的莫逆之交。陶晶孫在上海主持《大眾文藝》時，尾崎秀實曾多次撰稿。尾崎秀實邀請陶晶孫合譯的中國第一本左翼話劇集《蜂起》（日譯本），由陶晶孫親自作序。而陶晶孫在上海因參與左翼話劇演出，被國民黨軍警追捕時，曾逃往尾崎秀實家中避難三日。尾崎秀實還曾在上海，將佐爾格的重要助手、日籍左翼記者山上正義，介紹給陶晶孫為友……。

尾崎秀實於1941年10月，又在日本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他利用好友、在位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偵獲了日軍即將南下亞洲，並對美國開戰的絕密部署。然而，尾崎秀實卻也因此導致自己與佐爾格一起被送上絞架。當尾崎秀實被日本法西斯判處死刑的消息在中國傳開，中日反戰人士一致出面大力營救時，陶晶孫卻出奇一般保持了緘默，並從此不再提起這位摯友的名字。也許正是特殊奉獻者之間的特殊友誼，使他“此處無聲勝有聲”。

對陶晶孫鮮為人知的秘密工作內情，夏衍曾對陶瀛孫作如許透露：“抗日戰爭爆發後，陶晶孫和他的夫人彌麗，留在上海。1937年12月，我和潘漢年同志同船離滬南下香港。潘漢年曾告訴我，他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孫留下來，因為晶孫長期留學日本，與日本文藝界有廣泛的交往，讓晶孫隱蔽下來，為我們做些工作。由於這是黨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隨便說陶晶孫是‘漢

奸’，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事實上，他和左翼女詩人關露一樣，他的行動是受潘漢年領導的。”

舉家逃離臺灣，飛赴日本

史料還證明，抗戰勝利後，陶晶孫曾立即協助潘漢年，把日本醫院的貴重物資，秘密轉運到蘇北新四軍軍部。

1946年，陶晶孫與潘漢年商量後，經潘漢年批准，加入國民黨接管大隊，渡海前往寶島臺灣，參與接管日軍留在臺灣的重要戰略物資，此後留在臺灣生活。（陶瀛孫語）

據陶瀛孫介紹，陶晶孫與潘漢年的已知工作聯繫，可靠材料即如上述；曾有小報根據想像演繹成大段離奇故事，則純屬虛構。現存史料尚無法揭示陶晶孫在臺灣的具體工作狀況。

據陶晶孫的家人回憶，陶晶孫抵達臺北後，便由友人、國民黨政府衛生部長羅宗洛親自保薦，參加了接管臺灣大學等項工作，並出任臺大醫學院教授與熱帶病研究所長。

在風景如畫的臺島椰林海灣，陶晶孫和彌麗還曾熱情接待由日本前來探望他們的安娜，聽滿臉愁容的安娜，悲悲切切地訴說郭沫若返華參加抗戰後，留在日本的家人遭遇。安娜在日本曾受郭沫若牽連而被捕，並因受刑損害了健康，卻仍以柔弱的肩膀，獨自挑起撫養五個子女的重擔。在漫長的苦難歲月，安娜曾在一家作坊長期燒鍋、煮拌漿糊，因過度負重而導致脊椎變形；後來改行，承包做醃蘿蔔，十個手指經常被冷鹽水咬得血跡斑斑。家貧欠債無處央告之時，安娜拉著幼子郭志鴻的手，走街穿巷去推銷布料，卻又飽受軍國主義者當眾野蠻欺凌……可是，母子們那些年從未悲觀和哭泣，只是盼望侵華戰爭早日結束。如今，安娜正打算由臺灣轉赴中國內地，去與丈夫郭沫若團聚，並已為此簽字放棄保留了一生的日本國籍。

陶晶孫和彌麗聽到這裡，低著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們倆如此長嘆，因為安娜還不清楚，郭沫若返華後半年即已再婚，並又生下五個孩子。可憐的安娜夫人，現在難以回“家”了。正是陶晶孫和彌麗離滬赴臺前夕，郭沫若在一串尿布被風吹得飛飛揚揚的房間，向他們倆介紹了年輕的妻子于立群：“喔，她就是黎明健（於立群做電影演員時的藝名），我的愛人。”陶晶孫夫婦把上海所見向安娜稍作“吹風”，實在無法再給安娜更多幫助，便滿懷同情地挽留她在家中休養了三週，而後送別她渡海去香港，與闊別的郭沫若進行一次苦澀的會面（新中國成立後，安娜與長子郭和夫定居遼寧省旅大市，拒絕享受“國家要人家屬”待遇）。轉眼就到了1950年初。

正當陶晶孫在臺灣大學等處忙忙碌碌之時，中共臺灣地下省委書記蔡孝幹被捕後叛變，供出了中共情報網打入國民黨上層、高居國防部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後被槍斃），和以臺灣大學醫學院助教為掩護身份的中共臺北地下市委書記郭秀琮（後叛變），以及中共華東局駐臺女機要聯絡員朱楓等潛伏幹部（朱楓壯烈犧牲於臺北街頭，現已由中國安全部公開追認為烈士）……這一系列惡性事件，導致臺島發生了針對左翼人士的持續性大捕殺。

警車日夜呼嘯、血案不斷之際，一位消息靈通的遠親緊急通知陶晶孫，他的小兒子陶易王，因參加反獨裁的左翼學生運動，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單。陶晶孫早已嚴厲警告小兒子：“決不能圖一時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對革命不利！”（陶易王語）倘若陶易王此時被捕，暴露的就決不是他一人。陶晶孫曾多次“把從國民黨那裡得來的情報，及時告訴進步學生與年輕人”（陶晶孫次子陶坊資語）。

陶晶孫感覺危險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為名，向當局申請隻身離開臺灣。他其實走關係購得五張往返機票，迅速帶著彌麗和三個兒子，舉家飛離臺北。

據陶易王回憶：我們隨父親“逃離臺灣，一切準備工作都是秘密進行的，為了製造假像，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只有父親一人出門似的。來機場送行的人，看到我們全家上了飛機，都很吃驚。父親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會被扣押。”

撰寫不朽遺著，在日本與魯迅意義同等

陶晶孫一家飛抵日本東京，在東京暫住後，即利用得力的社會關係（據說曾得到某些具有正義感的幫會人士幫助），轉移到郭沫若與安娜夫婦曾居住的市川市，被那裡的親友妥善保護起來。

政治空氣稍緩之後，陶晶孫便由著名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先生等文化名人舉薦，出任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專業講師，那是冰心女士返回新中國後留下的空缺。

於是，陶晶孫在東京一邊教學，一邊行醫，一邊寫作，恢復了安定生活。生性浪漫的他，甚至沒有忘記託人去臺北家中，取回那把古色古香的大提琴。昔日在博多灣抱洋閣，他曾用這把大提琴為邂逅而熱戀的日本姑娘彌麗演奏巴赫；如今，他想用筆和提琴，消解自己心中鬱結的憂愁——他們這一家人，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已出現新氣象的中國大陸；雖然他已與新中國取得聯繫。

陶晶孫用日文寫作善於中文。他的日語，雅緻溫樸、清淡靈動、幽默有味，且富有生活氣息，蘊含種種日本趣味，其筆墨之嫻熟老到，據說連一般日本作家也難以企及。因此，他在日本一公開露面，便被各家文藝報刊的編輯、記者包圍，要求賜稿。

二戰以後，中日民衆之間出現了鉅大隔閡。如何增進中日和平友好，並促使日本民族反省自己的價值觀等，已是國際性大問題。陶晶孫決定以一個熱愛與瞭解日本民族的中國老朋友身份，與戰敗後情緒激動不安的日本民衆，特別是文化界人士，像拉家常一樣談談這些問題。

他夜夜盤腿端坐在頂燈照耀的榻榻米上，以活潑溫蓄的散文筆調，從閒談生活小事入手，說出他對日本民族性格與民族文化的優劣評判。

由於他持著善意的規勸立場，又深知日本民族心理與文化情趣，即便諷刺挖苦日本人的缺點，也能引出讀者一片笑聲。譬如，他針砭日本人狹隘與小氣，就以開玩笑的寫法，猜測一位被他借用了小提琴的朋友，正提心吊膽地唯恐小提琴會被損壞。又如，他批評日本人習慣機械地模仿強者，卻不富有自我判斷與原創精神，就以他與大多數日本人彈鋼琴，喜歡刻板模仿著名藝人，卻又沾沾自喜為例。

他這種把大哲理蘊含於生活小事的寫法，外國人卻搔到日本民族性格癢處的深刻批評，藉著日式優美散文特有的感染力，頓時獲得日本各界讀者熱烈歡迎。

而他尖銳批評日本企圖“脫亞”，讓中國當殖民地，卻淪入被美國看管的糟糕地位，是歷史錯位性選擇造成的悲劇，文字雖然辛辣犀利，卻流露出對日本的真誠同情——他對那些認為中國此時同情是多此一舉的日本人，“不愠不惱地”重複著說：“儘管如此，中國還是要同情。”因為，中國人深知被列強欺壓是怎麼回事。

請看陶晶孫這些富有歷史哲理的闡述：日本“明治以後改向西歐一邊倒。與文明開化、富國強兵同來的，是對中國的輕蔑。”可是，日本在二戰中戰敗了。今天使日本人深感痛苦的歷史墜落者地位，以及半殖民地特有的腐敗、墮落與奴性，“所有這些病態事物，中國都曾有過”。“中國人早已知道，甘心忍受這種狀態，決不是獨立建國之道”。但是，中國不會侮辱日本，“單有同情不夠，要伸出手來，儘快一起前進”。“今天日本的領袖，不熱心於日中友好，不想知道中國的歷史、文明和人民生活，更不想中日互相協力”。日本如果繼續蔑視前進中的中國，不願維

護亞洲的和諧，必將犯新的歷史錯誤。

而他漫談中國文化，並不局限於對文學藝術的介紹，更著眼於點出中日共同的文化情趣與精神特徵。當他運用自己的生花妙筆，顯現出構建亞洲共同文化目標的美好元素後，便幽默而深刻地指出：“中國先於日本在亞洲扎下了根。眼下日本卻還在一意孤行‘脫亞’，恨不得搖起自己的島國之槳，去與西歐合流。我卻堅信有朝一日，日本必定會回歸亞洲的。”

出眾的文筆、思想與德性，使陶晶孫身邊聚攏大批日本進步文化人。這給流寓日本的陶晶孫，帶來極大的歡愉。在日本作家鼓動下，陶晶孫不斷為報刊撰稿，並在多處發表演講，積極建議日本民族以良知看待中日關係，看待日本前途與世界未來。

戰後陷於悲哀與迷茫的日本知識分子，紛紛把陶晶孫視為善良、公正、理性與和平的化身。

不少日本著名人士至今感佩地說：“陶晶孫確定了我一生的和平建國方向”；“充滿文化良知與高尚情趣的陶晶孫，是這一代日本人最敬愛的作家”。

日本德高望重的文學評論家伊藤虎丸先生，這樣評價陶晶孫的日語散文：“陶晶孫實際上是與魯迅有同樣意義的作家。……可能會給中國方面意外的結論是，超越了狹窄的中國文學研究範圍，對日本文學和思想給以影響的中國作家，除魯迅而外，陶晶孫是唯一的人物。……他對日本的批評，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在被焚毀的廢墟中，和對侵略戰爭反省的基礎上，樹立了建設新日本的決心，也樹立了超越黨派和專業的廣泛共識。……亞洲的知識分子，理應到魯迅和陶晶孫那裡謙虛學習，從內心深處接受他們的忠告。……為了構築真正的友情，必須首先發現共通的精神與文化目標。魯迅和陶晶孫所提出的，正是日中知識分子如今共同面臨的課題。”

日本著名作家奧野信太郎先生，則盛讚陶晶孫的日語著作，

是“一本應該反復閱讀的書，……這裡蘊藏著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時候都充滿輕快的幽默和微笑，……還沒有見過對中日關係如此深刻剖析並富於教訓的文章。……真可謂警世的文學，為世上有識者共同矚目。”

日本著名文學家草野心平先生指出：陶晶孫在“發生大悲劇的時代，從親身經歷中產生出崇高良知，獻給日本讀者以橫跨兩國的哀傷與激動”。他的日語著作，將永遠激勵日本讀者思索與進步……

1952年2月12日，陶晶孫因患肝癌不治，在市川市病故，年僅55歲。愛妻彌麗守候在他身邊，陪伴他走完了坎坷而非凡的人生旅程。

陶晶孫終於未能如願返回他眷戀的祖國。根據親友的意見，他的骨灰一分為二，分別安葬於市川市公墓與東京青山無產階級無名戰士公墓。市川市公墓黑色晶瑩的墓碑上，刻著陶晶孫手寫的兩句詩：“颱風從井裡起，洪水從沙漠來”。

為了紀念這位唯一安葬於日本的中國傑出作家，經日本作家們倡議，彌麗夫人參與選編，1952年當年，便由創元社推出陶晶孫日語文集《給日本的遺書》（收編雖不甚完整，卻已可反映全豹）。倉石武四郎先生用一句話，說明了出版初衷：“如果書籍也可以像酒那樣分級的話，它可以說是特級書了。”

多年以來，《給日本的遺書》在日本讀書界形成獨特而鉅大的影響。不少讀者把它奉為“案頭必讀”。一些文科學生，則把其中美文當作輔助教材來讀。

1995年，日本東方書店又將《給日本的遺書》第三次出版。伊藤虎丸先生在充滿感情的長跋中，再次指出它對日本健康發展與亞洲和諧共進，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他並懇切表達了對中國出版界的期待：“考慮陶晶孫在日本知識分子中引起的鉅大反響和發生的深遠影響，可能中國知識分子也會有瞭解他的願望。……

真希望見到在中國出版《陶晶孫全集》，和他日語文章的中譯本。”

歷經 56 年，遺著譯本在祖國問世

然而，《給日本的遺書》中譯本出版過程曲折而漫長。正應了一句中國老話：好事多磨。

經彌麗夫人於 1993 年仙逝前親自示願，人民文學出版社於 1995 年，首次出版了由著名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編選的《陶晶孫選集》。但其中絕大多數為陶晶孫的早年中文作品，僅收入晚年日語散文三篇（由陶晶孫在華胞弟陶乃煌醫師翻譯）。

《陶選》出版前後，丁景唐先生與陶晶孫在華親屬，均曾多次呼籲翻譯出版《給日本的遺書》，卻由於散文既不易翻譯也不易發行，始終沒有一家出版社肯應允此事。

2001 年，陶瀛孫老師再一次與出版社聯繫碰壁後，命我助其一臂之力。

我豈有良策，便去稟告著名文化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請求他玉成此事。元化先生頗願促成此書翻譯出版。但他作風嚴謹細緻，詳細詢問此書各篇內容，見任何人都無法給與具體回答，便建議先找一位合適的譯者，寫出各篇梗概，以便研究、協商。我便就近委請元化先生的一位弟子、華東師大教授承擔；但他剛譯完日文漢學專著多卷，已疲憊不堪，接手不久即因體力不逮而謝絕。此事便擱置下來。

陶瀛孫老師於病逝前，再次囑託我這個愚鈍的學生，一定要代她實現這一心願。先師沉甸甸的遺囑，簡直成為我的心事。

我遂於抗戰勝利 60 週年之際（2005 年），特撰長稿一篇，詳述陶晶孫的非凡生平，與《給日本的遺書》的不朽意義，以期引起各界關注。但此文在大陸居然沒有一家報刊願意採用，其中原因錯綜複雜，既有政治上的顧慮，也有技術上的考慮。此文後經

元化先生在《香港文匯報》兼職的弟子協助，於該報分章載出，並立即獲得良好反響。一些熟識的讀者直接來電，鼓動我乘此東風，大力呼籲出版《給日本的遺書》中譯本，以饗廣大華文讀者。

我遂將這篇拙作連載稿，贈送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年輕女編輯呂晨（她是元化先生的再傳弟子，其導師錢鋼博士則是我的已故好友）。呂晨讀後十分感動，遂向該社郊中培總編輯力陳此書的出版價值。蒙郊總編輯明鑒，不久便確定了《給日本的遺書》出版選題。出版社希望我代聘一位合格的譯者，因為，這畢竟是此書 50 多年來第一個中譯本。

經上海遠東出版社資深編輯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副主編聯合出面，聘定翻譯家林少華（村上春樹著作的譯者）翻譯此書。但林先生因檔期等問題，後又轉請翻譯家王偉華、曹亞輝伉儷代勞。

王、曹二位經過兩年苦幹，現已大功告成。據出版社說，譯筆頗可。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給日本的遺書》第一個中譯本，終於要在陶晶孫的祖國問世了！祖國和同胞沒有忘記這位海外赤子。

這不僅可以告慰陶晶孫先生的在天之靈，也可以告慰所有關注此書出版的中日文化界人士。

遺憾的是，已仙逝的彌麗夫人、陶瀛孫老師、王元化先生等人，都無法看到這個中譯本了。